

第一章

導論

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及與世界體系的日益融合，中國的快速城市化已經是一個世人矚目的事實，它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人口分佈上的變化，還是一種社會結構性的變化，以及一種文化上的變遷。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城市向鄉村拓展和延伸，不僅體現在城市的擴容及市政建設等方面，更是在消費、觀念及生活方式方面；而另一方面則是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及市鎮，尋求生存和發展。由此出現了人類歷史上規模少見的人口遷移：幾億人口在短短二、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內離別鄉土，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或短期、或長期的工作和生活。

這個社會基本背景以及龐大的城鄉新移民給城市和鄉村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而這個一般被稱為「農民工」或「民工」的人群也被政府、媒體及學界等多方面關注，儘管通常乃是作為一種社會邊緣群體來看待，甚至在一些地方和時期還被作為一個「問題」來處理。

在最近三十年前後的中國社會中，基督教，特別是新教的迅速發展無疑也是另一個令人關注的現象。其信徒規模從一九四九年的七十多萬，到一九八二年的三百餘萬，到一九九六年的大約一千萬（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再到二〇一〇年的二千三百〇五萬（中國社會科學院《二〇一〇年宗教藍皮書》），這個增長速度相當驚人，被一些人稱為「教會史上最大的復興」。¹從中國基督教的發展階段來看，一般認為，一九八十年代以及之前，主要是鄉村基督教的發展，尤其是河南、安徽等地。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城市教會得到快速的發展，特別是北京、上海等地。

而與中國整個城市化進程相伴的一個現象則是，大量鄉村基督徒也進入城市務工，特別是在二〇〇〇年以後這個增速似乎更為明顯，出現了一個顯著的鄉村基督徒隨着城市化進程湧入城市的現象。²其中一些鄉村基督徒進入城市已有的教會，或三自教會或家庭教會，³當然也有相當一些人暫時離開教會甚至放棄信仰。但另一些人則聚集起來，形成以民工群體為主的小組、團契和教會，並由此逐漸產生了一種位於城鄉之間的信徒和教會形態。由於它雖然處於都市或都市邊緣，但其信仰形態與鄉村教會更為接近，因此我稱之為「都市裏的鄉村教會」。⁴由於這種城鄉新移民通常被稱為「民工」，相應的，這種新型的教會也常被稱為「民工教會」。

1. 這還只是根據官方或準官方的資料，沒有採用其他更高的民間資料。關於中國基督徒的人數問題，參見黃劍波、翟杰霞，〈中國基督徒人數之爭的學理與政治〉，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35（2011），頁301-315。

2. 這裏所劃定的年份並不是一個準確的用法，不過旨在指出一種趨勢和大致的形態，事實上鄉村基督徒一九九〇年代就開始進入城市，只是規模相對不夠顯著。另外，一九八十年代以及以前也並不是沒有城市教會的發展，而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後也不是說鄉村教會就沒有發展了。

3. 不少學者已經指出「三自教會」或「家庭教會」的說法不夠嚴謹，也不能完全反映中國基督教的現狀，這裏僅從方便的角度繼續使用這種說法。

4. 黃劍波，〈城市化過程中的中國基督教〉，二〇〇五年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辦的第三屆漢語基督教研究圓桌會議（昆明）論文，現載李秋零、楊熙楠編，《現代性、傳統變遷與漢語神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下編，頁933-948。

顯然，無論是城市化及民工群體，還是我們特別提到的民工基督徒群體，都理應得到更多的關注和研究。

一、研究背景及現狀

確實，對於城市化及民工群體的研究已經相當多了。不過，總體來說，已有的對於民工群體的關注和討論比較多的集中在生存和發展的問題上，包括就業、居住、醫療、子女教育、留守兒童、婚姻家庭等方面。這些無疑都是這個群體（或者說任何人群）最切身和直接的關切。⁵近年也逐漸出現一些關注民工及其子女的文化生活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討論。然而，對於他們的宗教或靈性，及其與他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卻少有涉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這個初步研究試圖以基督教信仰及教會為例來探討這個被人忽略的議題，並期待看到更多的類似研究，不僅僅是關注近些年來廣為談及的基督教，也包括佛教、道教、伊斯蘭教、民間信仰等各種宗教形式及其信徒群體。⁶

對於中國基督教的研究可以說也不少了，但總體來說已有的相關經驗性研究多數關注的是鄉村教會，⁷例如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基督教》（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黃劍波，《四人堂紀事：中國鄉村基督教

5. 我自己也曾就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做過一些調查研究，見黃劍波、成功，〈市場、社會、國家與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以浦東新區的民工子弟學校為例〉，載《青年研究》8（2005），頁3-12；黃劍波，〈農民工子女的基礎教育——主要以北京市朝陽區為例〉，載《青年研究》9（2006），頁32-39。

6. 馬強對廣州穆斯林群體的研究也部分涉及民工群體，見馬強，《流動的精神社區——人類學視野下的廣州穆斯林哲瑪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7. 關於詳細的中國基督教的經驗性研究，參看黃劍波，〈二十年來中國內地基督教的經驗性研究述評〉，載《基督教思想評論》第9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345-366。

的人類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03）；李峰，〈鄉村基督教教職人員的社會階層分析——以浙南Y縣X鎮基督教為個案〉（載《晉陽學刊》3〔2006〕，頁45-49）；夏磊，〈道場上的十字——對一個皖中村莊基督教傳播過程的研究〉（<http://www.ruralchinawatch.org/content.asp?id=686>〔刊登及瀏覽於2007年〕）。也有少量研究是集中討論城市教會，例如何哲，《城市中的靈宮》（香港：明風出版，2009）；高師寧，《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香港：道風書社，2006）；黃劍波、楊鳳崗，〈北方某沿海城市基督徒的家庭倫理和工作倫理〉（載《基督教文化學刊》第11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267-274）。

顯然，特別針對民工基督徒群體的研究非常少見，其中陳村富和吳欲波的研究儘管以城市化與基督教為題，但主要討論的是城市化對鄉村教會的影響。⁸其他目前能收集到的中文發表文獻也主要是一些調查研究報告以及比較初步的分析，例如黃劍波，〈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基督教〉（載余國良編，《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中美基督教交流十五年回顧與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頁402-418）；艾菊紅、黃劍波，〈都市裏的陌生人——城市新移民基督徒的信仰和社會生活〉（載《道風》26〔2007〕，頁115-136）；劉琪、黃劍波，〈民工教會近距離：一個現象的考察〉（載《當代宗教研究》2〔2007〕，頁1-10）；應明，〈社會文化處境中的民工基督徒及教會〉（載《教會》總第八期〔2007年11月〕，頁7-17）；黃劍波，〈信仰的實用理性與意義

8. 參看陳村富、吳欲波，〈城市化過程中的當代農村基督教〉，載《世界宗教研究》2（2005），頁65-70。

給予——中國城鎮民工的宗教生活〉（載《二十一世紀》109〔2008年10月〕，頁104-110）；黃劍波，〈「承認的政治」與信仰生活——以一個民工基督教會為個案〉（載《基督教思想評論》第10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291-298）；劉琪、黃劍波，《日常生活與信仰群體中的卡里斯瑪——以民工基督教會為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1）。

實際上，這裏所列舉的幾篇文章基本上都是我們這個研究小組在過去幾年中的一些發表。⁹那麼，我們的主要研究問題是甚麼，或者說，這一系列的研究到底是要達成甚麼目標？

二、研究緣起與過程

在回答上面這個問題之前，或許應當先交代一下這個研究的緣起及過程。在二〇〇〇年前後展開關於鄉村基督教的研究的時候，我就已經強烈感受到城市化進程對於鄉村教會的深刻影響。在二〇〇三年完成博士論文之後，我用了兩年時間寫作一個關於城市教會的個案研究的民族志。二〇〇五年夏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寫作期間，蒙香港建道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及梁家麟教授之邀，與數十位朋友分享關於城市化進程與中國基督教的一些初步觀察。二〇〇五年秋，我又在這次講座文稿基礎上撰寫了一篇文章參加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昆明召開的第三屆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圓桌會議，得以與到會的各位師友交流。二〇〇七年三月，香港中文

9. 另外還有一篇英文發表，Liu Qi，〈北京農民工家庭教會探析〉（A Close Look into an Immigrant Workers' Home Church in Beijing），見《新宗教》（*Nova Religio: 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Emergent Religions*, 12.4），頁91-98。

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也邀請我與一些感興趣的朋友就這個話題繼續展開討論和交流，特別得到了刑福增教授和姚西伊教授的一些回應和建議。

在剛開始比較集中關注這個議題的時候，我注意到其時幾乎沒有甚麼已有的相關研究文獻。五年過去了，這種狀況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¹⁰在此期間，儘管我自己對此一直深為關注，卻有近兩年的時間因在美國進修而無法繼續做第一手的田野調查。幸運的是，我得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支持，他們在過去的這幾年中分頭在各地展開調查，並完成了十一份比較完整的田野報告，一共四十多萬字。

在這十一份田野報告中，其中北京（艾菊紅和劉琪）、上海（褚瀟白和丁玉婷）、雲南怒江（劉琪和程韋帆）分別有兩份報告，是由不同的研究人員針對不同的人群所做的調查和記錄。其他報告所涉及的地方包括石家莊（馬恩瑜）、大連（孫曉舒）、重慶（江秋雨）、昆明（李建欽、趙心靜、師夏青）和吉林延邊（褚瀟白）。很顯然，我們的研究未能涵蓋南方沿海的大型城市，例如深圳、廣州，也未能涉及一些基督教發展快速的地區，例如河南、浙江溫州等地。這留下了很多的遺憾，也使得我們的研究顯然還有進一步展開和延伸的必要和空間。但這些田野報告以及我與這些報告人的交流成為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書稿的最根本的基礎，因為我們的研究不是從概念到概念，而主要是在經驗事實上的一些歸

10. 最近我驚喜地發現曹南來在其溫州基督教的研究中專辟一章來討論民工基督徒的問題，參見Nanhai Cao，《建構中國的耶穌撒冷：當代溫州的基督徒、權力和地方》(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頁126-162。

納和概括。當然，我們再次承認，這樣的研究本身由於選點的限制而解釋力有限，而其主要研究方法也有其內在的不足，但是我們至少做出了第一步的努力，也展現了團隊合作進行研究的可能性和美好。

在這些比較完整的田野報告之外，還有我自己在成都訪問民工教會的比較簡略的採訪筆記，以及苗雨前往雲南茨中調查的簡單筆記。另外，丁玉婷還曾跟隨那些到上海務工的基督徒去江西鄉下做了十多天的觀察和訪問，也做了一些初步的筆記。此外，在上海的調查過程中，除了最後完成報告的兩位研究者，還有孫豔敏、成功等人也參與了其中的一些階段，為最後的調查報告完成做出了貢獻。而昆明的調查也先是由陸燕等人進行了一段時間，後因家庭等原因只能中途退出。在此，要向所有這些全程參與及部分參與的研究人員表示敬意和感謝，所有這些努力和勞苦都值得紀念。

如果從二〇〇五年開始啟動這項研究算起，到二〇一〇年夏天完成全部調查研究報告，前後一共五年。回到之前的那個問題，其實這五年的勞苦最初的一個簡單目標就是想知道到底民工基督徒和民工教會是怎麼回事，期待在大量的田野調查中形成對民工基督徒的初步印象和認識，並能在多個田野點的基礎上構成一幅相對全面的關於整體形貌的拼圖。這個目標一方面無疑顯得有些簡單，似乎缺乏理論的深度，但同時其實又非常困難，因為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對整個中國的民工基督徒及教會有全面的了解。

三、理論議題與文本撰寫

在試圖了解中國部分城市的民工基督徒群體的這個

基本關切之外，我們其實也還有一些其他的理論關切。首先，我們關注中國基督教在結構和形態上所受到的城市化進程的影響，也就是說，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中國基督教出現了甚麼的變化，或所謂的「轉型」，特別是已有的城市教會和鄉村教會在這個過程中所受到的衝擊。

我們也關注鄉村基督徒進入城市之後是如何繼續其信仰的，並特別關注他們又是如何逐漸聚集形成「他們自己的」教會的；而對於那些進城之後才歸信的民工基督徒，我們則很關注他們的歸信的理由及過程，或者說基督教的甚麼東西，或教會的甚麼品質吸引了他們，或者說滿足了他們。而這從更大的層面上來說，其實是希望能用這些案例來討論所謂文化斷裂與延續的問題，因為在這些民工基督徒身上可以看到兩個重要的變化：城鄉之變及信仰之變。但是這種變化是否意味着就是完全的斷裂？如果說有延續的話，又是在甚麼意義上的延續，或者說採用了那些方式確保了其延續？而這個文化變遷的議題無疑是普通人類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界都關注的問題，特別是其變遷的動力，變遷的模式以及變遷的走向。

更進一步，我們也試圖理解過去的三十年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意識到我們仍然是在一個更大話語即現代性的敘事中，所謂變遷其實就有了一個對傳統的體認的問題，也就是說，甚麼是傳統，如何持守傳統的問題。

這些關注也就構成了我們這個研究的意義，或者說理想，即它首先是一個「基督教研究」，討論的是基督教的問題，或者其中某個基督徒群體的問題。其次，它也是一個「人類學研究」，試圖處理一些文化理論的議

題。最後，它還是一個「中國研究」，試圖對於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文化場景提供另一個角度的理解。

不過，我們也意識到，儘管理想很宏大，能達成的卻是非常有限的，其中既有學識上的限制，也有諸多其他的困難。這裏簡單提及兩點。其一，雖然我們的題目很大，試圖討論「中國城鎮民工基督教」，但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目標，一方面因為所謂中國，其實也是相當多樣化的，而所謂城鎮就更是差別很大，既有從特大型、到大型，再到中小型城市及市鎮的區別，也有東西部、南北方之不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實基督教，儘管我們還只是討論的基督新教，也有相當多樣的形態。

其二，由於我們的田野調查所涉及的地方，如前所交待，其實並不能完全覆蓋主要的民工基督教形態，或者說，所謂代表性的問題本身是大有問題的。而且，在最後實際的文本撰寫中，我主要還是以大型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的特定形態的專門的民工教會為重點展開討論，而無法真正談到後文中將提到的種種多樣的民工教會形式，以及民工基督徒的信仰方式。

儘管意識到種種不足和問題，我們還是一頭栽進了這個超出我們實際能力的議題。在這幾年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在各地做第一手的田野調查，並撰寫了一些調查報告以及專題論文，除了前面提到的發表之外，還有機會在一些學術會議上與同仁交流，例如黃劍波，〈城市化與中國基督教〉，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辦「第三屆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圓桌會議」（昆明，2005年）；〈承認的政治與信仰生活——以一個民工基督教會為個案〉，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山大學主辦的「首屆

中國宗教人類學研討會」（廣州，2010 年 3 月）；Huang Jianbo，〈北京的民工教會：在家與在大都會城市中作基督徒〉（Migrant Workers Church in Beijing: Being Christians at Home and in the Metropolitan Cities），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中國社會中宗教與社會整合：探索中國世界的宗教研究的社會學取向」（Relig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Exploring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in the Chinese World）國際會議（香港，2007 年 6 月）。

得益於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支持，最後的文稿寫作完成於香港道風山，不過，並不是簡單地將之前的文章集結在一起，實際上很多部分都做了相當大的調整和修訂，並另外撰寫了幾個章節。最後的文稿結構一共有七章來展開，分別是：

第一章 導論：介紹研究背景和現狀，研究緣起及過程，理論關切和文本撰寫。

第二章 城市化進程與民工「問題」

第三章 中國基督教的形態及民工教會

第四章 歸信的解釋

第五章 承認的「政治」

第六章 作為信仰（及生活）共同體的民工教會

第七章 結論與討論

特別要說明的一點是，由於這是一部在田野調查基礎上完成的書稿，所以在正文之後，我們大量附錄了經過篩選後的田野調查報告，希望這樣可以讓讀者更直接

地接觸到第一手的田野材料，並隨着田野研究者一同「進入田野」，體會他們以及被研究者的經歷和感受。